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

暨爱民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在其他各业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罕见的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学质量提高,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布局进一步合理,尤其是中等教育的发展跃居全国前列,为湖南后来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湖南战时教育既具满足战争需要、服务抗战,又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育在战时湖南之所以有如此进展,是由于湖南各界军政领导的重视、湖湘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湖湘文化精神的支承,以及外地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湖南教育 发展概况 特点 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京、沪相继失守,全国“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①,教育因之受到巨大损失。在此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采取“维持正常教育”、“战时须作平时看”之措施,于是年8月27日,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要求“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努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②但许多学校因战乱而难以为继只得停办,如河北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及水产专科学校、山东大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章,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页。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章,第8页。

学、山东农学院、上海吴淞专科等^①，许多学校纷纷南迁湖南。但随着武汉失陷，长沙危急。迫于时势，在湘的许多学校，尤湘中、湘北城市中学校不得不向西南偏隅迁移，构成教育由中心向边缘发展的态势。不同于其他省市，这一时期湘省的教育取得罕见发展，尤初、中等教育，其学校数和学生数同期居全国第二、三位。^②本文拟对抗战时期湘省教育的发展概况、特点和原因进行研究。

一 战时教育发展概况

(一) 各级教育规模增大

抗战爆发后，湖南加紧了小学教育的推进。至1939年，全省小学增至28800余校，1940年湖南省府制定《湖南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纲要》，到1941年时，全省1609个乡镇，已在1491个乡镇设立中心学校，国民教育普及率达93%。国民学校方面，全省20138保，只有1050保未设保国民学校，普及率达95%。另外，还有未改办的私立小学6285所，基本实现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小学生人数到1939年已增至1211573人，1941年达1598476人，以后逐年增加。至1945年，小学校数目增至32000多所，学生增至2168000多人。教职工的数量也在累年增加，抗战爆发时的1937年，有教职工51025人，1939年增加了

① 毛礼辉、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②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3编统计，初等教育方面，以1939年的义务教育为例，学生数为112.7万人，仅次于四川的204.5万人，居全国第二，学校数27487所，甚至超过四川，教育经费投入也仅次于四川。中等教育方面，《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编统计，至1945年，湖南有中等学校280所，学生9.2万人，居全国第三，四川1940年就有公私立中学448所，广东1945年时有388所。又见宋斐夫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45页。

6054 人,至 1941 年增至 64916 人,至 1945 年时已有教职工 78895 人。同时,短期义务教育从 1935 年开始实施至 1940 年 8 月实施国民教育止,共办 10 期,总计有 29029 班,每班约有 40 人,计有学生 1161160 人。另外又在湘西乾城、凤凰、永顺、保靖、泸溪、古丈、麻阳、通道等县设置短期小学,从 1937 年至 1940 年,先后共办 540 班,每班约有 40 人,共计有学生 21000 人,学生的质量也大幅提高。^①

中等教育发展最为突出。1937 年,全省公私立中学仅有 81 所,到 1945 年,所设中等学校就已增至 280 所,仅次于四川和广东,居全国第三位。^② 据 1941 年朱经农所撰《三年来的湖南教育》统计:湖南历年中等教育经费的省款部分约占省预算教育文化经费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1938 年至 1941 年,因中等教育的积极发展,经费年有增加,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省库开支的经费,1941 年度比 1939 年度增加 300 万元,而且开支审慎、款不虚糜。三年中,省立中学按计划增设,县立中学根据需要次递增办,新兴私立中学大大增加。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1937 年时为 30782 人,1941 年时增至 59770 人,至 1945 年,增至 91916 人。教职工人数到 1945 年时,教职工已达 6715 人。^③

抗战开始以后职业教育受到格外重视。据王德华在《湖南中等教育概况》中所述:1937 年湘省公私立职业学校已有 44 所,至 1941 年实施分区设学后,每一行政督察区都配有 1 所省立职业学校,另还设有 2 所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县立职业私立学校,因为开

① 以上数据引自朱经农《十年来之湖南教育》,朱厅长任职十年纪念册,《十年回忆》,湖南教育厅编印,1942 年 10 月。

② 见前引《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4 编。

③ 《湖南省志》第 17 卷《教育志》上册,第 306 页—307 页。

办设备不易,故入学者不多,其发展势头没有中学迅速。至1946年底为止,省立职业学校有12所和1个补习班,县市立职业学校11所,私立职业学校39所,总计有63所职业学校,有职业学生7520人。其中高级职业学生3310人,初级生4210人。职业学校的设科,尚能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高级职业以工科、农科、医护科为主,低级以刺绣、缝纫等科为主。有14所职校办有高级工科,内分机械、电机、化学、纺织、土木、水利、电信、皮革等科别,有6所职校办有护士助产科,19所职校办有农科,办商科、文书科和艺术科的职校较少,仅有1至3所,其余的17所都为缝纫刺绣等科,服务于战时的色彩很浓。^①

师范教育发展迅速。1937年共有39所师范学校,但自1941年实行分区设学办法,同时各县国民教育的迅速发展,对师范毕业生形成巨大的社会需求,师范教育因而迅速发展。迨至1945年,湖南师范学校共计有59所,其中省立11所,联立、县立师范学校48所,学生总人数达16297人,教职员有1599人。

高等教育在湖南发展较慢。湖南高校原仅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938年,为适应湖南战时中等教育发展对师资造成的需求,创设了国立师范学院。1941年,又在南岳创办了三所专科学校: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开设有农艺、森林、水利三科;工业专科学校,开设有建筑、水利、化工、矿冶四科;商业专科学校开设有银行、会计、统计、工商管理等科。每期学生均有增加。^②

(二) 教育布局渐趋合理

1940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新县制》,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

① 王德华报告:《湖南中等教育概况》,《教育通讯》第2卷,第39期。

② 朱经农:《十年来之湖南教育》。朱厅长任职十周年纪念册,《十年回忆》湖南省教育厅编印,1942年10月。

建国纲领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乡镇中心学校实施要则》、《保国民学校实施要则》等，规定每一个保设国民学校 1 所，每一乡、镇设中心国民小学 1 所。6 月，湖南省政府据此颁订《湖南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纲要》、《湖南省各县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实施办法》等文件，促进湖南小学学校布局合理化。抗战爆发之前，如 1932 年，湖南 2 万多所小学中，长沙有 1000 多所，湘乡 1500 多所，而靖县只有 30 多所，保靖仅有 20 所，这种布局极不合理，但至 1941 年止，一乡镇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的设校计划，除岳阳、临湘等沦陷区外，已基本实现，湘西的偏僻山区县份，也大部分实现了该计划。和小学的分布格局一样，抗战爆发前，全省的公私立中学多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主要城市，这种布局使偏远县份的文化教育更为落后。1941 年起，省政府为改变这种布局，谋学校之合理配置，实施分区设学办法，将全省按行政督察区域，划分为十个中学区，订定分区设学计划，每区设置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一所，县立中学、私立中学也在分区设学原则下同时增加。为此，于同年秋，教育厅将国立八中师范部改为省立所里师范学校，国立十一中师范部改为洞口师范学校，同时分别于耒阳、衡阳增设了省立农村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和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使省立师范和职业学校实际各为 12 所。1942 年，将省立二中一分校改为十一中，屯区联立初中改为省立屯区中学，于南岳设立省立十三中，是故，这年省立中学有 13 所，省立师范学校实为 11 所。1943 所，省立屯区中学改为省立十三中，省立一师一分校改为省立十一师范，省立洞口师范改为省立十二师范，省立四职分校改为省立十一职校，省立高级农村医事职业学校改为省立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因此，这年省立中学和职业学校各实为 13 所，省立师范学校有 12 所。

另外，为避免日机轰炸，各县立中学也暂迁往学区境内的安全

地区,多为教育不甚发达的偏僻之所。长沙、衡阳等地群集的私立中学,也迁往各县乡村,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学校布局的进一步合理化,有利于边远地区和乡村教育的发展。如湘西、湘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等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展较快,其中安化、泸溪、邵阳、零陵、保靖、沅陵、凤凰、溆浦、乾城、永顺、大庸等地就有很多省内省外中学和政教机构迁入,增多了这些地区青年的入学机会,促进了该地区原本落后的文化教育的发展。1943年,少数民族地区有中等学校共20所,在校学生共3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有600多人。

(三) 外地学校纷迁入湘,教育质量提高

抗战全面爆发后,平津等地的学校面临危机,无法在原址坚持教学,只得相谋南迁。北大、南开、清华三校迁往湖南长沙,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①10月28日,经数月准备后,“长沙临大”开学。但由于日寇步步进逼,长沙屡遭日机轰炸,迫于形势,在上课三个月后“临大”于1938年4月又搬迁到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大”迁滇,异常艰辛,对此胡适曾感慨“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②

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外,1937、1938年外省搬迁来湖南的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它们都相继迁至省会长沙。随着日军犯湘,湘北、湘中等地沦为战区,沿海省市沦陷区的学校和知识分子迁入偏远的湘东南、湘西等山区。1937年,湖南省政府为顺应时势变化,将全省划分为三个教育区:湘东区、湘中区和湘西区。外地学校(主要是中学)纷纷迁入这三个教育区。南京私立行

① 郭冠球:《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文史资料》1989年6月。

② 《益世报》1946年11月2日。

健中学、五州中学、三民中学先后迁入桂阳人和塘、益阳马迹塘和邵阳廉桥。^① 1937 年,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由南京迁到湘乡永丰镇。1938 年 8 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到湘西, 将国立安徽中学迁到乾城, 后改为国立八中, 收容皖省中等学校流亡师生, 校本部设在乾城, 另在洪江、永顺、绥宁、保靖、麻阳及四川的秀山等地设分校 6 所, 全校教职员有 380 余人, 收纳学生 4000 余人。1938 年, 教育部又派杨宙康、吴学增在武冈竹蒿塘创立国立十一中学, 收容湖北、湘北等地的流亡师生, 初时教职员有 150 余人, 学生 1500 余人, 第二年, 学生猛增至 2000 余人, 1944 年又因战事, 先后迁至凤凰和辰溪上课。1939 年, 由江苏迁到湖南桃源的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迁到所里, 更名江苏旅湘临时中学, 1941 年并入国立八中, 1946 年抗战胜利后, 才迁回原籍。

外省学校迁入湖南, 给湖南带来高质量的师资和全新的教育理念。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育专家、名教师的到来, 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而且将他们的考试、招生制度, 先进的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学校的管理理念等带进湖南教育, 促进了湘省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1940—1945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过六届全国专科以上学生学业竞赛, 在前三届竞赛中, 湖南高校学生获甲、乙、丙三类各科目第一名的就有 9 人次, 尤其是第三次竞赛, 乙类师范学校 16 名, 国立师范学院即占 12 名, 湖南大学则占了水利工程系的全部名额, 丙类的文学院和医学院第一名分别为湖南大学和湘雅医学院所获。^② 教育规模方面, 以中学为例, 1938 年全省 87 所, 较上年仅增 6 所, 但从 1938 至 1944 年间, 每年都以数十所的速度增加,

① 《湖南省志》第 17 卷《教育志》上册, 第 286 页。

②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 第 449 页。

1944年时达267所。师资学历合格率由战前的不足20%增至将近31%。^①另外,外省学校来湘,更有助于救亡运动的开展。尤其是长沙,在抗战初期成为全国的教育、文化、抗日中心之一。外省学校来迁的影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 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

湖南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湘西。抗日战争前夕,湘西兵燹频年,纷争不止,加上匪祸、饥荒和瘟疫,教育更是迟滞。追溯有清以来的湘西教育,中学仅有凤凰、永顺2所。1925年,因川军袭扰,凤凰的湖南省第十二联合中学停办,仅存永顺的第十联合中学1所。多年来,政府对湘西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剥夺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至抗战爆发前夕,终激起苗族上层人士的义愤。1936年,凤凰县苗族名绅龙缉伍、龙达三,乾城县苗族文化人士石启贵,永绥县苗族官绅、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石宏规及凤凰县教育界人士刘佛林,联名向湖南省政府递交《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其中《教育》第七款为要求:“增设苗乡短期小学及民众班”,以发展民族小学教育,使边区“特种部族”和“土著民族”能受到教育,边区得到开化,而达于“固国族,以宏抗战力量和启示平等”。湖南省政府虑及对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于省府常委会第693次会议上,通过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在湘西特区对“土著民族”实施“国防教育”和“边区特殊教育”,并作出“议决”,责飭省教育厅和湘西苗防屯务处主办实施。^②

1937年6月,湖南省教育厅遵奉省府指令,统一实施“二年制短期义务教育制度”,省府第702次常会修正通过《湘西特区教育

① 《湖南省志》第17卷《教育志》上册,第431页。

② 《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计划方案》油印件,湖南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档案馆藏。

实施办法》，议决在乾城县小溪庵创办“湖南省立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必要时迁所里镇浣溪书院”^①，培养短期义务小学师资，然后分配到凤凰、保靖、乾城、永绥、泸溪五县苗区，开办了短期义务小学 170 个班。1938 年，拨出屯谷 5000 石，开办湘西有屯 7 县联立初级中学，简称“屯区中学”，招收 7 县“土著民族”学生。1943 年 6 月，湘西苗族上层人士又以湘西为“土著民族”、“化外”特区为由，破除了省政府一个专区只设 1 所省立中学、1 所省立师范、1 所省立职校的“规定”，使省教育厅将“屯区中学”改设为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招收“土著民族”子弟入学，同年又于凤凰县黄丝桥和永绥县卫城，为“土著”、“边胞”设立了 2 所“湖南省立边区小学”。^②

湘西既为抗战大后方，又是通往西南的门户。抗战爆发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沦陷区的学校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社团纷纷迁来，分布大半个湘西，本省长沙等地城市的学校随着战争的深入也大举内迁，使湘西教育骤然兴盛。从幼教、中教到高教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1938 年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流亡妇女和儿童，组成“妇孺教养院”迁入凤凰。接着，在 6 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中国战时儿童教养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分别迁入泸溪、乾城、凤凰，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和“爱幼院”分别迁入永绥县和大庸县，“第九战区教师服务团”主办的“难童小学”迁入乾城河溪，湖南省立第四中学迁入泸溪县城，国立第九战区战时中学、兴华中学、辰郡联立中学迁泸溪浦市，国立第八中学、江苏旅湘临时中学迁乾城县所里，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迁入泸溪浦市，江苏省立银行专科学校迁入乾城县所里，后改为国

① 保靖县档案馆藏朱经农手令油印件。

②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教育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立商业专科学校,再又改为国立商学院,等等。除学校外,还有一些教育机构与教育社团也迁入湘西。第九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教育部社教工作团第九施教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失学青年工读服务团、湖南省图书馆等都来到湘西。迁入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社团中,汇集了一大批教授、教育专家、学者,他们除在本校任教外,还纷纷在湘西创办学校和教育机构,到湘西各县所办的中学任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先驱朱其慧、晏阳初在泸溪举办平民教育;战地教师服务团的200名大中小学教师都下到湘西各县城乡中小学任教。国立八中成立后,发展很迅速,师生曾一度达5000多人,部设齐全,有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另外从1941年至1945年,湘西十县先后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湖南省政府也给予支持,于该时期内,先后在湘西设立了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十三中学,省立第八师范,省立第九师范及省立第八职业技术学校,又从紧张的教育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给湘西使用。湘西民族教育,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被称为“湘西教育继清末留学的第二次辉煌”^①,这为以后湖南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战时教育发展的特点

分析湖南这段炮火下的教育发展史,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适应战时形势,满足战时需要,实施教育改革,是抗战时期湖南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战时教育应具战时的特色。张治中莅湘后,在对湖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的同时,也进行了教育文化的改革。他对形势的认识非常清醒:“这一阶段,是决定我

^①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教育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们国家民族命脉安危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有所踌躇,多所顾忌。”^①“我们觉得在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重要关头,一切都应该在极大的变革中来求进步,以增强抗建工作的力量,特别是因为教育是培养后辈青年,培养民族活力的渊源,更不能不渗合时代精神,力求适应”。^②张治中认为,要加强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将人民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决定通过改革教育,发动学生实现组训民众,增强抗日力量之目标。1937 年底,他经与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人多次商讨后,在省府会议上通过了利用青年学生组训民众的计划和具体措施:“所有高中以上的学校暂时停办一、二学期,预派五万青年学生下乡村,往全省开展民训工作,为期六个月,六个月后,学生仍返原校,继续学习,补足课程,另派第二批学生到农村中去。通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使新知识分子、新青年与农民结合的民训运动,加强对乡村民众的教育,拓宽青年学生的视野,提高乡村民众的文化水准,加强抗敌自卫力量,作好战时准备”。张治中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为适应战时之特殊需要,必须给青年学生以新的教育和必要的民族主义教育,青年学生要抱有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站到“民族抗战的实际基础上,去做活的工作,去求活的经验,上活的课堂,要他们从学校里的死课本转移到社会的活课本上,去受社会的教育,尽国民的责任”。^③

1938 年,张治中出巡湘西考察教育,认为必须对教育的组织与人事、教育的精神与礼节、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方法等进行彻底的改革和整顿。他指出目前湖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法:第一,当前教育中普遍存在校课与时代脱离的现象,

① 《汉口大公报》,1938 年 7 月 20 日。

②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6 页。

③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 233 页。

校课的设备与国家面临的时局极不相应。因此,更张教育制度,改革课程设置以满足战时状态,应是教育中的一大要务。第二,教育发展不平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湖南的学校,中学大部分布于长沙、常德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大学则完全集中于长沙,湘西、湘南的一些县份,很少有中等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也不平衡,70%在城市,乡村得到的不足30%,这极不合理。他说:“如果拿人口的数量,比照教育的设施以及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的状态”。照此下去,“如果教育的作用,不能从少数大城市推动到边远的县份,如果文化的光辉不能从城市普照到广大的乡村,其影响决不止于教育上的失败,因为广大乡村永远空虚下去,广大的农民永远闭塞下去,就不单纯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①对此,张治中提出,在省府的施政纲要中,重新划分教育经费的比例,规定重新分配省立中等学校设立地点,并以大半迁入农村为标准,尽量移设边区,同时要筹设联乡小学、联保小学,以普及农民教育,增进农村文化。第三,忽视思想教育,教学与训育分离。他主张改变教育方针,实行教训合一,建立和培养近代学校制度和风气,培养学生具有追求上进,爱家卫国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优秀人格,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修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1938年8月8日,全省教育会议召开,通过了许多改革湖南教育的积极性主张,如制定训育方案,拟议课程改革,决定筹办分区设学,确立教师专任制度,提倡男女同学,改良集训办法,设法增筹教育经费,缩短中学修业年限,充实学校实习设备等等,张治中改革教育的思想在其中得以体现。这次会议对湖南教育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如张治中指出这次会议“确是湖南教育史上一个划时

^①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234页。

代的记录”。^①

其二,发展不平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速度不平衡。在湖南抗战时期的初等教育(包括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普通中学、中等师范、中等职业)、高等教育(包括专科学校、大学或学院、国外留学)和社会教育中,中等教育发展最快,初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较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认识上的变化。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更能适应战时需要,更能提供适用于战争、服务于抗战的人才,有利于抗战的胜利。正如余先砺先生说:“中等学校为训练中级干部人才之场所,亦为各级教育之桥梁。”^② 因是教育界力倡中等教育,以与战时环境相配合。这时期中等教育“为本省教育史上”“富有活力之新页”。^③ 对于小学教育,人们认为,“小学教育为国民教育之基础,关系抗战建国至为重大,更应配合各方面,一致动员,因此,时无论政府以及社会各方,对于国民教育,莫不加以整理与推进”。^④ 致“国民教育亦有飞跃之发展”。^⑤ 第二,省府和地方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上的差别。应该说这是前述认识变化的结果。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和不平衡,可通过下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①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 237 页。

② 余先砺:《十年来湖南中等教育》,《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③ 余先砺:《十年来湖南中等教育》,《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④ 夏开权:《十年来之湖南国民教育》,《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⑤ 余先砺:《十年来湖南中等教育》,《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湖南省教育文化经费投入比较表^① (单位:元)

项目	1937年	1938 (半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总计	4044398	1430619	2547412	2886639	9825432	11689602
初等教育	996755	360899	750545	857335	1645712	3696678
中等教育	1790580	705345	1223473	139246	4640606	4388430
高等教育	587642	204663	287770	314306	2808410	1518044
社会教育	92984	81714	92669	110046	213383	398341
其他	576437	77998	192955	232486	517321	1687109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2年的湖南教育文化经费开支中,中等教育经费每年几占全年投入的一半以上。1938年至1941年中等教育经费年有增加,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省库开支的经费,1941年度比1939年度增加了300多万元。中等教育发展最快也就在情理之中。经费投入居第二位的是初等教育,投入最少的是社会教育,所以社会教育“不十分发达”,前教育厅长朱经农先生言“尚待吾人之努力”。^② (2)分布区域不平衡。这种状况历史尚久,至30年代初朱经农来湘时仍未有改善。于初等教育“分配至不平均”^③,湘中的一些城市,一市就达千余几百校,而湘西、湘南某些县份,一县都只有20—30余校。中等教育的分布也同样不平衡,“学校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二、三都市,未能平均发展,边区子弟就学艰难”。^④ 高等教育则表现为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集中于长沙,群治法政学院则分设湘沪。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直至抗战爆发后的前几年,湖南省政府、教育厅采取分区设学、

① 湖南省图书馆藏《湖南省历年来教育文化经费统计比较表》,载《湖南教育概况》。

② 朱经农:《十年回忆》,《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年9月。

③ 朱经农:《十年回忆》,《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年9月。

④ 王凤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湖南日报》1946年5月22日。

普及国民教育等各项措施,使这种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变,教育整体布局趋于平衡和合理化,但于湘西、湘南的僻远地区,受各种条件限制,使这些措施很多仍流于形式。

三 战时教育发展的原因

首先,湖南省府和有关官员的重视与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湖南地方政府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自晚清以来,从戊戌期间的陈宝箴至以后抚湘的庞鸿勋、端方、赵尔巽等人,都较注意普及教育,创立各类学堂。辛亥后,谭延 数度督湘,亦热衷教育,与湘省著名教育家胡元 等人,共同扶持湘省教育。至何键,虽力行尊孔读经,但并不排除对湖南教育的支持。1932 年,为湘省教育发展大计,他委中大教授萧孝嵘、湖南国货陈列馆馆长刘廷芳两先生入鲁,力邀教育界名士朱经农先生南下赴湘,任教育厅长一职,改造、发展湖湘文化教育。1937 年 11 月,张治中被南京政府作为承乏湖南省主席的人选,曾对朱经农说:“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不及我对于一般教育兴趣的浓厚。”^①他抱着“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②的信念,对湖南教育进行改革,使湘省教育更趋于全面、合理。

教育厅长朱经农的贡献和作用尤为突出。1932 年侯入湘,即为湖南教育经费的独立而奔走,终使湖南的教育经费有了较为稳定的来源,暂时解决了当时教育中最为棘手的经费问题。1932—1943 年他任湖南教育厅厅长一职十年有余,期间的贡献,主要为以下几点:第一,创办众多小学,力谋普及国民教育。在省

①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 238 页。

②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 141 页。

政府和教育厅普及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制订实施后,他躬亲为事,努力督促,在1941年底基本完成普及国民教育计划。第二,创造性地提出“募田募山”作为解决教育经费困难的重要途径。假如“各校自身无基金,全持中央及省款补助,必难有成”。他认为:“欲谋一劳永逸,首在募田募山,田能收稻,可发实物;山能种植杂粮果树,亦可解决经济困难。”^①第三,力持发展中等教育,尤其在湘西等偏僻山区创设各类中等学校,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逐步解决学校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使全省的每个行政督察区都能保证有一所省立中学、一所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第四,协助省垣等城市学校的搬迁工作。为完成这项任务,朱经农多方协调,为省垣的大、中、小学迁往安全地区继续开学提供必要的援助,为抗战后湖南教育能继续发展保存基础。第五,设法推促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莅湘时,初具规模的高校仅湖南大学一所,湘雅医学院尚未完成立案手续,群治法政学院分设湘沪两地,规模小,立案困难。为此,他指出:湖南高等教育第一要务是奠定三校基础,再图发展。他设法帮助湖南大学完成国立运动,湘雅医学院也设法完成立案手续,群治法政学院改办农商学院,并帮其在长沙选定校址。1938年,他作为国立师范学院的筹委会委员之一,为国立师范学院的创立和以后的发展甚具劳绩。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去辞,薛岳继任。他“揭橥教育文化为三大建设之一”^②,不断增加教育经费,“三十年度分区筹设中等学校,省教育经费陡增四倍,三十一年度,复有增加”,其投入的经费

① 朱经农:《十年回忆》,《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年9月。

② 薛岳以生产、卫生、教育三大建设为施政中心。

“空前庞大”^①，“三十年度省内预算，教育文化经费总额，竟达 1230 余万元”，“其重视教育，于此可见”。^②

其次，以“心忧天下”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精神作用，尊知重教和坚强不屈的湖湘文化性格，塑构了抗战时期湖南的教育特色。湖湘文化是湖湘历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经受了历史的陶洗和筛拣，在民族存亡关头，能激起湖南人民奋起改变屈辱的生存状态，建构民族良知和历史良知。所以，研究抗战时期湖南教育的发展，断然不能割裂这种文化的延伸和人文精神的传承接续的作用。“教育正是坚持精神理想和健康人性的中流砥柱”。^③以教育唤醒民众，将阶级的情感化约为民族激情，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整合各类力量，共拒外族侵略。是故抗战时期“教育救国”的呼声自有其历史的逻辑性和文化的合理性，也是民族自身感悟的升华。湖湘民众通过发展教育，培植更为坚执的民族勇气、热诚的民族关怀和独立的民族尊严，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力侵略和愚民奴化。湘北临湘县于 1938 年 11 月陷落后，“百业俱废，学校停办”^④，但临湘师生采取“敌来我走，游击教学”的方法^⑤对付日本人。而日军在临湘办日中、东兴、复兴、和平、维新小学和亚兴高级小学等 9 所小学，在岳阳县开办日华、日新、维新等小学 10 所，进行奴化教育，遭到了当地人民和小学师生的坚决抵抗。^⑥在学校大迁徙和重建中，湖湘人民从物质和精神上帮助广大教师和学生克服了重重困

① 王希烈：《十年来之湖南教育经费》。《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9 月。

② 朱经农：《十年回忆》。《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1942 年 9 月。

③ 摩罗：《耻辱者手记》：《提问小学教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临湘县教育史料首批初稿汇编》油印件。

⑤ 《临湘县教育史料首批初稿汇编》油印件。

⑥ 《湖南省志》第 17 卷《教育志》上册，第 137 页。

难,胜利完成了搬迁工作,尤在日机轰炸长沙以及长沙大火后,许多学校的校舍、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变成一片废墟,学校教育损失惨重,但在各方努力下,教育迅速得以恢复,弦歌不辍。

正是凭此精神,抗战时期,湖南虽处极度困难之中,但“各地方各族姓竞相设学”,教育“以迅速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现象是“为战前所未有”。^①

第三,前文已述及的省外学校迁湘,不仅使湖南的学校、学生、教师数量增加,而且由小教到高教结构日趋完善。外省文化人或云集长沙或散居湘省各地,提高了湖南教育的质量,推进湖南教育全面发展。

第四,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湖南“农村经济尚可称安定繁荣”。^②在1944年以前,湖南全省沦陷区面积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湘北,以长沙、常德、衡阳为中心的湘中广大地区,虽有沦陷,可不长一段时间后,旋被收复,其地区经济虽遭破坏,但程度不及北方广大地区深,至于湘西等偏远之区,就更为稳定,经济甚至未遭日寇直接破坏,这为广大农村的学校及外地搬迁而至的学校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另外,重庆国民政府也对许多搬迁来湘的学校和湘省本土的一些学校,如国立八中和湖南大学及国立后的湘雅医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拨出一定款项经费,数量虽少,但也不失是一重要扶助。还有一些民间热爱教育人士的捐赠,也为教育的发展增添了力量。

第五,由于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才匮乏而产生对教育的需求。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落后,服务于战争的人才匮乏,致使中国军队在民族抗战中的不足充分暴露出来,甚至导致战场上的失利。

① 王风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湖南日报》1946年5月22日。

② 王风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湖南日报》1946年5月22日。

国民党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38 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就很能说明问题。“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国家教育在平时若健全充实,在战时即立著其功能,其有缺点,则一至战时,此等缺点即全部显露,而有待于急速补救与改正”。^① 战争需要多方面知识的人才来为之服务,人才则须通过教育来培养,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和发展,湖南人民同样强烈感受到教育落后带来的各种困窘和遗憾,故“需要教育甚为迫切”、“维护教育亦特别热烈”。^②

统览抗战时期全国的教育,除四川等省由于未遭日寇入侵、又为陪都要地等原因,发展特别迅速外,其余省市,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普为日寇蹂躏,破坏惨烈。然而湖南教育,无论长、常、衡等中心城市还是湘西、湘南之僻远山区,都获得相当跃进,于当时全国数省市中,绩效彰然,中等教育居全国第二、三位,诚属难得。湖南教育于战时取得这些成绩,意义和作用不只是提供了服务于抗战的人力和知识资源,更深远的是奠定此后湖湘教育发展的厚实基础,外化了优秀的湖湘文化精神,给今天教育的继续发展和不断进步贡献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

(作者暨爱民,吉首大学历史系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1 编,第 2 章,第 8 页。

② 王风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湖南日报》1946 年 5 月 22 日。